

最新插图版

原著 罗贯中

校注 韩琳

三国演义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三国演义



最新插图版
原著 罗贯中
校注 韩琳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演义 / (明) 罗贯中著; 韩琳校注.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8.1
(中国古典名著文学: 原著导读版)

ISBN 978-7-81132-199-9

I. 三… II. ①罗…②韩…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3883 号

原 著: 罗贯中
校 注: 韩 琳
封面设计: 袁 畅

三国演义

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编: 330046 电话: (0791)8529392, 8504319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787mm × 1092mm 1/16 50印张 800千字

印数: 5000

ISBN 978-7-81132-199-9

定价: 29.00元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是许多中国人成长历程中的必读书。毛泽东一生就曾多次阅读四大名著,在他的著作中,处处可见四大名著的影子;鲁迅、郭沫若、巴金等文学大家也在少年时代就阅读过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是中国乃至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文化遗产,是经过历史的长河淘洗和筛选过的优秀作品,具有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有效地引导青少年阅读四大名著,将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语文能力和人文素养,有利于青少年在阅读中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的精华。2001年和2003年,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对原有《语文教学大纲》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做了较大的改动,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广大中小學生加强阅读,其具体篇目中就有对四大名著的要求。现行的学生语文教材也选录了多篇出自四大名著的文章,如“林黛玉进贾府”、“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等篇目。本套名著就是根据“新课标”对中小學生课外阅读的要求,配合语文教学的需要,携手国内中小学语文教学专家精心编撰而成,希望能够提高中小學生阅读水平提供服务。

此次出版的这套四大名著遵循了以下几项原则:

版本经典 均以最早或最为通行的刻本为底本。《红楼梦》以目前市面上公认的最好版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为底本,并参考了舒序本、戚序本、蒙府本等版本;《三国演义》以自明代以来一直流行至今的毛宗岗版本为底稿;《水浒传》以容与堂本为底稿,参照天都外臣序本、杨定见序本等校注;《西游记》以明金陵世德堂刊本为底本,并参照清初《西游证道书》、清康熙丙子年的《西游真诠》等几种版本整理而成。

校注权威 校点、注释基本汇集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以经典版本为校本,特邀古汉语功底较深的出版专家担任校注。校注人员结合中小学语文教学专家的教学经验,针对中小學生的知识接受水平和知识点需求进行校注整理,对青少年阅读、消化四大名著能起到非常好的帮助作用。

注重引导 四大名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是,由于受到历史和时代局

风云际会的壮美史诗 《三国演义》导读

罗贯中(1330~1400),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后移居杭州,性“与人寡合”,却与元末明初杂剧家贾仲明为忘年交。“有志图王业”,曾充当过元末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幕僚。想建立一番事业,后朱元璋统一天下,他的政治抱负落空,遂转而从事小说、戏剧创作,其戏剧创作,贾仲明评之:“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他的小说著作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等。

《三国演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同我国古代群体智慧和创造力密不可分的,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椽笔纵横,把近一个世纪的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和矛盾斗争,熔铸成一部完整的生动的演义小说,它明显带有“拥刘反曹”的倾向。《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赏,不仅是我国历史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而且是我国古代演义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小说。

《三国演义》,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为人民所熟悉。

《三国演义》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开始,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晋朝史学家陈寿把这段历史编成史书《三国志》,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博引群书,注文多出本文数倍,增补了许多材料。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是一本写三国历史的史书。同时,有关三国的故事一直流传不断。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着重记载魏晋名公士族的言谈轶事。据杜宝《大业拾遗录》记载,隋炀帝时已有曹瞒樵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水上杂戏。唐朝李商隐的《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可以看到,当时已用三国人物作为笑谑的材料。宋、元时代,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说三分”(即说三国故事)已是“说话”中的独立科目之一,并出现了专说“三分”的著名艺人。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故事的最早讲史话本,是元初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刊刻的《三分事略》,可能就是宋人说话的底本。《三分事略》共分上中下三卷,从刘秀

赏春、司马仲相阴间断狱开篇；正文从桃园结义开始，以诸葛亮病死结束，长达八万多字，虽然叙写简率，但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金院本、元杂剧也常常搬演三国故事，现今存留的剧目就有四十多种，剧本有一、二十种。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就是在上述史书、杂记和平话、戏曲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者是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的说法，是符合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的实际情况的。

现在可以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甲寅（公元1494年）序、嘉靖壬午（公元1522年）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则，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至于这个刻本与罗贯中原本之间，内容上有无不同，现在没有资料可供说明。在这以后，《三国演义》刊本越来越多，现在可见的明末刊本就有二十多种，说明流传很广。有的刊本除了加上总评、回评、眉批、夹批外，内容上几乎是相同的。

清朝初年，毛纶（字声山）、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假托“古本”，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修订，并逐回评论。他们在修订中，进一步突出以蜀汉为正统，明确指出，把曹魏定为正统是错误的，而采用朱熹在《通鉴纲目》里关于蜀汉是正统的说法，声称“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读三国志法》）其次，是推崇关羽，认为关羽“报主之志坚”，“酬恩之义重”，“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毛纶、毛宗岗如此修订《三国演义》，使得封建正统思想和封建礼教观念更加浓厚。清朝统治者很看重《三国演义》，曾派人同《四书》一起译成满文，并对作为“忠”“义”化身的关羽大加吹捧；同时，为了鼓吹封建伦理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统治者还大肆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他们以标榜“为明复仇”为号召，修建朱明陵园，自居于继明的“正统”。毛氏父子的修订，跟清代统治阶级的观点是正相符合的。此外，毛纶、毛宗岗对文字情节也作了不少改动，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所说：“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这种修饰加工工作，改变了原本若干松散拖沓的地方，使全书更加紧凑畅达，成为《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的一种本子。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刊行之后，至今又约三百年了，内容上没有什么大变动。

《三国演义》写作的演变过程，有值得注意的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在集体创作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作者有民间艺人，也有封建文人，他们的政治、艺术观点和创作意图各有差别，在漫长时期的传说和口头、书面的艺术创作里，集纳和熔铸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内容，所以《三国演义》表现出较为复杂的思想倾向。第二，它是历史小说。三国的人物故事久已流传，为人们所熟悉，这就使创作活动

受到某种制约,即不能完全无视原有的三国人物和故事。然而,作者虽不能全盘改变原有的人物和情节,却可以根据自己的世界观来决定取舍,有意识地突出或删去某些方面,进行艺术虚构,利用各种艺术手段来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等等。所以,《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三国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而是一部经过艺术构思和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它一定程度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和生活面貌;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某些罪恶;提供了认识封建社会政治、军事斗争的部分材料;并塑造出一些较有影响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颇具特色。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封建文人编修的史书,固然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即使是民间的、或接近于民间的文艺,也经常受到地主阶级思想不同程度的侵蚀。因此,在民间流行的平话和戏曲,有的封建意识也相当浓重,如《三分事略》、金元戏曲中的三国戏,封建意识就十分明显。《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立场出发,不但承袭了“正史”和平话、戏曲中的一些封建意识,而且还根据当时封建统治的需要,某些方面有所强化,这应该引起注意。由此可知,《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它展示了三国的历史画卷,描写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暴露他们凶残阴险的种种罪恶,广大人民遭受蹂躏时痛苦和不幸。另外《三国演义》在鼓吹实施“王道”、“仁政”的同时,歌颂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鼓吹“英雄”史观、神权思想和封建迷信;提倡封建道德,特别宣扬“忠”“义”等。因此,我们一定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教导,有批判地阅读《三国演义》,把这部小说当作了解我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思想材料。

《三国演义》内容丰富,思想博杂,它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示了复杂的人物关系,对政治、军事、社会伦理道德等提出了许多自己的看法。

(一)小说通过战乱给人民带来痛苦的描写,表达了人民渴望统一的心情,作者充分肯定了有志于统一大业者。

小说开篇就说,由于桓灵二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给社会造成了诸多灾难,黄巾起义引起了各派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兴起,因此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国家无一安宁日。少帝继位,国舅何进掌权,被十常侍设计杀害,袁绍袁术杀宦官,董卓逼走袁绍,废少帝而立献帝。十七路诸侯以袁绍为盟主讨伐董卓……中原动荡,天下汹汹。战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第六回写董卓从洛阳迁都长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致使洛阳“火焰冲天,黑烟铺地,二三百里,并无鸡犬人烟”,驱使百姓迁徙长安的路上,真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图画:

每百姓一队,间军一队,互相拖押;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如有行动迟缓者,背后三千军催督。军



手执白刃,于路杀人。第十三回写李傕郭汜交兵,“但到之处,劫掠百姓,老弱者杀之,强壮者充军,临敌则驱民兵在前,名曰‘敢死队’”。

相反,稳定的政治局面与和平的社会生活则给人民带来了好处。第八十七回写蜀国“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凡遇差徭,争相早办。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物,无不完备,米满仓廩;财盈府库”。通过这样正反两方面的描写,小说反映出人民渴望和平统一,向往安定生活。

罗贯中虽然对小说中的人物有褒有贬,但是凡涉及到统一与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时,他对人物的评价态度则是一致的。只要有利于统一,有利于和平,不论是刘备,还是曹操、孙权、司马炎,对他们致力于统一、和平的事业都给予肯定。

曹操讨伐董卓、却除袁术、破击吕布、消灭袁绍、出征乌桓,扫荡群雄,统一北方,使半壁江山之内社会稳定。作者对这些行为持赞赏的态度,尤其是官渡之战,作者的倾向性更加明显,他歌颂曹操以少胜多的军事胜利,认为他扫清北方军阀的行为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统一的愿望。

罗贯中在小说中对蜀汉集团始终给予极热情的关注并表现出明显的偏爱,但是仍对后主刘禅“听信宦官黄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并在诸葛亮与之后的姜维的北伐大业中因多次掣肘而造成众多人为的困难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二)小说颂扬仁、义、信的道德理念,而批判不仁、不义、不值的行为。

作者的这一思想主要表现在对蜀、魏两个政治集团的领袖人物的描写。刘、关、赵等人都具有仁、义、信、勇的道德观念,但又各具特点。

从桃园结义开始,刘备便立下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言。他初仕安喜县尉,乃至做了大蜀皇帝,都能对民众丝毫无犯,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为己任。屯军樊城之后,曹军掩杀过来,在岌岌可危之时,他毅然决定带领百姓一起渡江,直至百姓渡江之后,方才上马。

在刘备身上,“义”的观念与“仁”同样突出。与关、张结义时,刘备立下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随后的日子里,三人虽偶尔意见不合,但举大事的大方向始终一致,并患难与共,相互帮助。听到关羽被杀死的消息,刘备数次“哭倒在地”,“泪湿衣襟,斑斑成血”,执意报仇,诸葛亮等人从孙刘联盟以抗衡北魏的大局出发,多次劝阻,但是他说:“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把“义”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刘备为私仇而征伐东吴,从事业的角度来看,是错误的,但从“义”的角度来看,又是相当可贵的。

赵云是“信”的人物的典型。加入刘备集团后,他一直以信为重,坚守投奔时所说的“云肝脑涂地,无恨矣”(第二十八回)的誓约。长坂坡乱军之际,人多疑赵云见刘备困窘而曹操势盛,一定投奔曹操以图富贵去了。赵云舍生忘死去百万军中寻找小主人阿斗,却未因刘备困窘曹操得势而弃刘投曹。街亭失守后,他却一人殿后,不失一器一械,可以说,为刘备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与蜀汉集团的领袖人物相反,曹操的形象则是残酷暴戾的,虽然他也有民本的思想,也曾下令不准许人马践踏田地,作战不误农时,但他这种行为并非出于本意,而仅是一种政治手段。因此,极度暴怒之时,他会露出暴虐的本性。徐州太守陶谦的部将将劫财而把曹操的父亲曹嵩杀死了,于是,曹操率大军攻打徐州,并且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以雪父仇。”结果,曹操“大军所至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报杀父之仇,竟屠杀徐州人民,可见并不重视老百姓的生命。

曹操待人毫无“义”、“信”可言,而只是奸诈、险恶、猜疑、诡谲。尚儿童的时候,他就假作中风,欺骗父亲,中伤叔父。官渡之战中,他的部队粮食将尽,粮官任峻部下仓官王垆来问他怎么办,他令王垆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曹暗中使人各寨探听,后密召王垆,不容分说,“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头高竿”,并出榜晓谕军队说王垆“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这种蓄意将人做替罪羊,无辜杀害的做法,可谓阴险至极。这样的人,毫无信义可言,刘备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不但不会这样去做,而且会极端鄙视。

作者热情地讴歌了“仁”、“义”、“信”的行为,把它当作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美的境界,认为人人都应该去追求它。相反,作者则无情地鞭挞了曹操的不仁不义的行为,描写时,虽然不加任何评论,但否定的态度是十分显然的。

(三)通过形象化的描写,小说对人才在社会分化、组合、统一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作了深刻地揭示。

一个政治集团要获取胜利,完成统一大业,需具备三个条件:正确的战略方针、深得民众拥护与有尽心辅佐的人才,而在这三点中,最后一点又最为重要。因为人才会提出正确的战略战术,并告诉领袖人物获取民心的办法。《三国演义》形象地告诉读者,依靠人才,信赖人才,就能够获取胜利;不重视人才,不网罗人才,就会走向失败,乃至灭亡。

董卓要迁都长安时,司徒杨彪进行劝阻:“今无故捐宗庙,弃皇陵,恐百姓惊动,天下动之至易,安之至难。”黄琬、荀爽也上前劝阻,然董卓一意孤行,还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于是建眉坞,盖宫殿,选美女八百,屯积的粮食足够吃二十年,自以为可以长治久安,却“眉坞方成已灭亡”,不久便命丧黄泉。吕布

勇冠三军,所谓“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可他没有政治头脑,缺乏远见,自恃武力,杀伐不止。还说“吾有画戟、赤兔马,谁敢近我?”下邳之战,陈宫多次献策,可他就是不听,结果身殒白门楼。他们不求、不用人才,结果,由强变弱,从胜利走向失败。相反,网罗并重用人才者,就会由弱变强,从失败走向胜利。官渡之战,处于劣势的曹操集团无论人力、物力,都无法和袁绍相比。战前,曹操忌于袁绍的力量讨伐袁绍的信心不足,在谋士郭嘉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客观情况,提出了袁军必败、曹操必胜的论断与理由之后,才鼓起了战胜袁绍的信心。袁绍兵广,曹军即将断粮,曹操意欲退兵,这时,许攸信说袁绍人马虽众却不能用,曹操才决心继续与袁绍对峙。不料曹操断粮后催粮的信又被对方截获,这时许攸来投。曹操采用了他的乌巢烧粮之计,大破袁绍获取官渡之战的大胜。随后,曹操采用郭嘉的建议,乘胜出击,迅速征服了乌桓;接着又按郭嘉遗计,平定了辽东。曹操信赖人才,并善于听取谋士的建议,结果很快就统一了北方。袁绍在这一战役中,恰好相反,不但拒谏不纳谋士的建议,还怀疑谋士别有居心,结果自食其果。

人才的作用在刘备从弱到强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刘备在未得诸葛亮之前,虽有关、张相助,自己也广施仁义,但是,屡战屡败,最后无插锥之地立足。此后,得单福,取得樊城之胜;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相助,才扭转了形势,新野、博望虽获小胜,但改变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增强了部队的信心。赤壁之战,孙刘联合,击败了曹操百万大军,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基础;后又夺取巴蜀,平定南蛮,抵御曹军,积聚成能够北伐的力量。可以说,如果刘备不得诸葛亮或者没有诸葛亮这一类能为他出谋划策、调兵遣将的经纶济世之士,他难以成就大业。

《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三国历史上的各种斗争,归根到底是人才之间的较量,是智慧的角逐。在激烈尖锐、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那些见多识广、聪慧过人的人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重视人才、知人善任的政治家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作者在《三国演义》的人物刻画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无论歌颂的或是批判的,都用心地描摹,既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态度,又表现出对描写对象客观特征的一定程度上的尊重。虽然不能说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个个都是生动鲜活的,也不能说他们大部分都具有现实中的丰富复杂的性格,但是,在漫长的小说人物画廊里,有许多形象是历代人民群众所认可,他们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有些人物甚至成了某种观念或精神品质、气质的象征。比如诸葛亮、曹操、刘备、关羽、张飞、周瑜、鲁肃、吕布、杨修、司马懿等等。因篇幅的限制,只来看看诸葛亮的形象特征。

杜甫曾高度赞扬诸葛亮,说他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形成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好像鸾凤高翔,独步云霄。他的谋略与古代名臣伊尹、吕尚等不相上下,而更在萧何、曹参之上。由于汉室气数已尽,虽经他千方百计的努力,终于未能挽救危局,然而,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高尚品质与卓越的智慧。

小说中的诸葛亮形象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人们崇拜、喜爱他,不断地从他的形象中汲取精神上的营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们看来,他不仅仅是“贤相”的典型,更是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理想人物。

小说中的诸葛亮形象,有以下特点:

(一) 忠心不二,死而后已。

书中诸葛亮对于刘备忠心不二,似乎带有封建的纲常色彩。但是实际上,他对刘备的这种忠心,决不同于曹操手下的人对曹操的那种对主子盲目的忠。不可否认,诸葛亮的思想行为不可能超越“忠”、“义”等封建道德的范畴,但是,作为一位有良知、有思想、有抱负的政治家,他决不会盲目效忠于一个君主,他会有所选择,选择一个值得他去效忠的人,这个人必须是一位爱护民众,能给民众带来幸福生活的君主。他之所以在 27 岁之前,一直“躬耕南阳”,在隆中隐居,而没有乘天下大乱各方诸侯招揽人才之际,走上政治舞台就是因为他有所选择。“三顾茅庐”对于刘备来说,是他礼贤下士,求才若渴,而对于诸葛亮来说,则是他对刘备的考验,看看他是否为“明君”。当刘备邀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时,诸葛亮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说:“亮久乐耕锄,不能奉承尊命。”后来刘备“泪沾衣襟袍袖,掩面而哭”,表现了他的诚恳和对天下百姓的关怀。认定了此人具有“匡扶生灵”、“拯救天下百姓”之心,诸葛亮才说“将军若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由此可见,他的“忠”,与其说忠于刘备,不如说忠于他所信仰的正义事业。

此后 27 年间,诸葛亮竭尽全力,经历过无数的艰难险阻、数以百计的战斗。他精心谋算,以寡敌众,以少胜多,变劣势为优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初出茅庐,火烧新野,帮助刘备改变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曹军压境,他冒险只身来到江东,舌战群儒,达成了孙刘联盟;赤壁之战,他一方面献计献策,一方面又提防着周瑜的暗算,一把火把曹操烧得焦头烂额,一败涂地,促成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彝陵败绩后,蜀国岌岌可危,可他不改初衷,忠心如初。南人叛乱,他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七擒孟获,平定南方;他以法治蜀,使百姓丰衣足食;他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一心要完成刘备未竟的大业。他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以致积劳成疾。当别人劝时,他说:“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吾尽心也。”“秋风五丈原”一段,最为感人。诸葛亮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然仍扶病理事,

临死前……强支病体，坐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他忠爱、留恋统一全国、救济苍生的大业“禳星延寿”的举动，虽然迷信，但是其本质上表现了他对事业的深情，他珍惜个人的生命，决不仅仅是为了多活些时间，而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投入事业之中，以实现他宏大的抱负。就在他即将辞世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蜀汉大军如何安全地撤回国去，如何妥善地安排自己的继承人，以便以后，蜀汉政权能够继续发展巩固，使北伐大业后继有人。诸葛亮对事业的忠诚，真正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如他对自己要求的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智慧超群，博识机敏。

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三国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当刘备第三次拜访他时，隆中对策，他就向刘备讲述了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

……孙权占据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州，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事实证明，诸葛亮提出的这一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它对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故小说以“定三分隆中决策”为回目。战略方针中的孙刘联盟，则突出地表现了诸葛亮决策的英明。他一生都在坚持实践他孙刘联盟的战略主张。赤壁之战前，他亲自出使东吴，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刘备集团有了立足之地；彝陵之役后，孙刘交恶，联盟瓦解，蜀汉背腹受敌，诸葛亮忧心如焚，选派邓芝出使东吴，与东吴重新“结为唇齿，一洗先帝旧怨”，才解除了北伐曹魏的后顾之忧。

诸葛亮的智慧与博识机敏在他出使东吴的系列故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舌战群儒”、“智激周瑜”、“智激孙权”、“草船借箭”等，无不令人钦佩。

（三）严于律己，赏罚分明。

诸葛亮一生廉洁朴素。未出山时，他躬耕于南阳，生活淡泊。后做了丞相，仍然一如既往。他坐的是没有油漆的车子，穿戴的是葛巾道袍，年年如此。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说：我一身在外，衣食都由国家供给。在成都家中，有八百株桑树，十五顷薄田，一家温饱有余，不要再增加私产。如果我在死的时候，内有余帛，外有盈财，那就对不起陛下。临终时，他明确告诉属下只要把他埋葬在汉中定军山，依山筑坟，墓冢只要放得下棺槨就可以了。收殓时穿平常的衣服，不

用器皿陪葬。小说中的描写完全是依据史实,绝没有虚构的成分。

赏罚分明,集中地体现于“挥泪斩马谡”。当司马懿击灭孟达后,魏明帝命其为都督,以张郃为先锋,率兵街亭抵御蜀军。诸葛亮命参军马谡为主将,王平为副将,领兵二万五千镇守街亭。马谡背离了诸葛亮的计划,又不听王平的劝阻,生搬兵法,屯兵山上。司马懿命张郃挡住王平,以大军围山,断绝汲水之道,放火烧山。马谡无奈杀下山西逃走,街亭失陷,致使蜀军的北伐付诸流水,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得而复失。蜀军统帅部也险些落入魏军手中。诸葛亮最赏识马谡,曾说“吾与汝义同兄弟”,但为了严明军纪,诸葛亮挥泪斩了马谡。

诸葛亮深责自己用人失误,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为此大哭不已,并对蒋琬说:“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他奏明后主,请求自贬丞相之职。作者对这种赏罚分明和严于律己的态度在小说中进行了热情的讴歌,读者也对诸葛亮发出无限的赞美之情。历代的人们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文人士子,一再抬高诸葛亮的形象。《三国志平话》说他“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三国演义》说他能够观天象,识阴阳,知奇门,通变化,完全当作一个“完人”、一个“超人”来写,这有损于他的历史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但是,总体来讲,诸葛亮的形象还是成功的,历代人民群众无比喜爱他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可以预料,在未来,他将作为智慧的象征与忠诚的榜样,仍引导与教育着我们。

《三国演义》表现各个政治集团主要是凭借武装力量达到消灭敌对势力的目的,于是,战争是他们之间斗争的主要形式。小说大约写了大大小小四十多次战役。其中,既有改变历史方向与进程的数十万兵力的大会战,也有中小型的战役与战斗。

在历史上,三国时候战事频繁,在战争中,丰富的战争经验被积累下来,我国的军事理论也得以发展,也留下了许多战争范例,这些为罗贯中的构思提供了根据与情节材料。另外,三国时代到元末明初的一千多年间,又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为军事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战争文学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加之罗贯中是个“有志图王者”,本身对战争理论有一定研究。因此,小说中的战争描写十分生动,在中外军事文学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

首先,小说中杰出的领袖人物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大体上符合军事科学的原则。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三国演义》中的三国的领袖人物,多是优秀的指挥员,知己知彼,深谋远虑,所以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战略方针。

《隆中对》表现了诸葛亮关于刘备集团完整的战略思想,他说:曹操在北方已拥有百万之众,又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无法到北方和曹操去争地盘;孙权继承父兄之业,有民众拥护的基础,再加上长江天险,我们也不能占领江东的任何一块地方,而且,曹操才是统一大业的劲敌,因此,只能联合孙权,而不能和他作对。这时惟一可行的办法是另图他处。荆州战略地位很重要,益州地区很富饶,因此,必须占据这两个地方,然后再北伐曹操,以完成统一大业。

诸葛亮这一战略思想,是在了解天下形势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设想。

孟获叛乱后,诸葛亮率兵南征。但是,他没有一味地剿杀,而是以武力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达到根本的“和”与“抚”的目的。这是一场非常特殊的战争,诸葛亮与孟获进行了一场持久而有耐心的较量。他七次擒住了孟获,又七次放他生还,等待对方的感恩。最后,孟获和他的妻子兄弟等亲族,都被感动得涕泪横流,心悦诚服,肉袒向诸葛亮谢罪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诸葛亮的这种战争方法,与当时特定的时间、地点非常吻合,并符合“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军事原则,其原因正如马谡所说:“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第八十七回)。也就是说,武力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只有使其心服,才能使南人永远归顺,才能在北伐时后院不失火。事实证明,这一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南征之后,西南地区在好多年内不但没有反叛蜀汉朝廷,还在兵员、军需上给予北伐很大的支持。

官渡之战,可以看出曹操完全是根据自己和敌人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战术的。袁绍兵马七十万,粮食充足,且具有地理上的优势;而曹军只有七万,粮食不多,地势上也不占优势。两军对峙时,因为袁军兵多将广,掩杀过来,“土山上一声梆子响处,箭下如雨。曹军皆蒙盾伏地,袁军呐喊而笑”,曹军大败,后退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终,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曹操听从许攸的建议,与袁绍速战速决,烧毁袁绍在鸟巢的粮食辎重,使敌人不战自乱。这场战争曹军大获全胜,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其次,小说善于把握各次战争的联系和区别,写出了每次战争的独特性。

小说用几次重大战役把从汉末到晋的大大小的战役与战斗联系了起来,使它们反映了整体的战争风云。第一次重大战役是诸侯联盟讨伐董卓。这场战役带来的是军阀的割据与混战,“袁绍磐河战公孙,孙坚跨江击刘表”(第七回)、“刘皇叔北海救孔融,吕温侯濮阳破曹操”(第十一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伯虎”(第十五回)等等,就是与第一次大战役相关的战役与战斗。第二次重大的战役是曹袁的官渡之战,这一战役使曹操在北方成了实力最

强大的军阀,于是,为了统一北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他展开了“夺冀州”(第三十二回)、“定辽东”(第三十三回)等战役,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第三次重大的战役是赤壁之战,这一战役造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的形成,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这一战役的序幕应该说是从“新野之战”就拉开了,战役之后,刘备据荆州,袭南郡,战南阳,又取零陵、桂阳,属于赤壁之战的连锁反应。赤壁之战使刘备的力量得以壮大,不然,他不可能改守御、退却为进攻的。第四次重大战役是彝陵之战。它是赤壁之战带来的。彝陵之战的动因是刘备为关羽等报仇,而关羽之死是因为吴国要索回刘备在赤壁大战后乘机占据的荆州。吴蜀交锋,曹丕乘机五路进攻蜀国。第五次重大战役是诸葛亮南征。这是一次民族战争,并且战役本身有无数次战斗,虽然过后没有战役与战斗,但是蜀国的北伐与此还是有紧密联系的,没有南征的胜利,很可能也就没有了六出祁山。抚定了夷越,安定了蜀国的后方之后,自然地就产生了第六次重大战役——北伐战役。北伐失败,诸葛亮辞世,蜀国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三国相持相争的稳定局面被打破了,司马氏各个击破,最后取得了全国的政权。由此可见,小说中的各次战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展现给观众的是一个整体的画面,而不是零碎的,阅读后使人有居高临下、俯瞰全局的审美感受。

一般的古代战争小说在写敌对双方的战争时,总是写两军对垒,主将出战,力量悬殊的,不需三五回合,一方将领便把对方将领砍翻在地,于是,大兵掩杀过去,杀人如砍瓜切菜,对方则兵败如山倒,士兵落荒而逃等等,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乏味枯燥。《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则和它们不同,它注意写出了矛盾的特殊性和解决矛盾的战略战术的多样性。

赤壁之战,主要发生在长江之上。周瑜的吴军为南方人,又在长江设防,故水师精锐,第一次与曹军在三江口交锋,吴国将领甘宁“驱船大进,万弩齐发。曹军不能抵挡。左边蒋钦,右边韩当,直冲入曹军中。曹军大都是青、徐之兵,素不习水战,大江面上,战船一摆,早立脚不住。甘宁等三路战船,纵横水面。周瑜又催船助战。曹军中箭着炮者,不计其数。从巳时直杀至未时”。在此情况下,曹军必须打造船只,训练水师才能跨过长江。但是水师的训练才刚刚开始,曹操就中了周瑜的离间计,杀了不可多得的水师头领蔡瑁、张允,使水师的训练被迫中断。这时,周瑜派庞统献了连环计:“大江之中,潮涨潮落,风浪不息。北兵不惯乘舟,受此颠簸,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或三十为一排,或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上铺阔板,休言人可渡,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他风浪潮水上下,复何惧哉?”曹操又依计行事,后来天气变化,东风骤起,黄盖诈降,引燃了曹操连接起来的船只,曹军惨败。“火烧”便成了赤壁之战的主要特色。水与火本是对立的,对于曹操来说,他面对滚滚长江,可能只在

“水”字上思考,如何才能克服水的障碍,而没有想到“火”对他的威胁,而周瑜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出奇制胜。

关羽与庞德、于禁的战斗,发生在陆地上,开始的两战,都是两军对垒,将领出阵,可后来于禁将大营移至樊城之北的谷口低洼之处,于是,关羽屯兵高阜处,决开汉水,以水来淹曹军,“四面八方,大水骤至;七军乱窜,随波逐浪者,不计其数”。这一次战斗和赤壁之战恰好相反。陆地上用水攻,也是出于对方将领意料之外的。当然,这决不是说不论时间、地点、条件,只要用求异思维的方法来决策,就能取得胜利。要战胜敌人,主要还是根据条件,灵活地指挥作战,如果于禁移军高处,如果那时正是枯水的冬天季节或者根本不靠近汉水,用水攻肯定也是行不通的。

再次,小说注意在战争中写人,通过战争充分展现人物的性格、禀性、气质和本领。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之所以鲜明独特,主要得力于作者把他们放在战争的舞台上充分的表演。战争是政治的较量,是人的阅历、眼光、心胸与修养的较量;战争是生命的抗衡,是人的胆识、意志、智慧和体力的抗衡;战争又是一种群体之间的拼搏,是各方领袖背后的精神与物质的基础力量的显示。

周瑜在《三国演义》中,性格是比较丰富的,他雄姿英发,风流儒雅,有远见卓识,但他也心胸狭窄,骄傲好强,不能容人。小说的作者不太喜欢周瑜,拿他当诸葛亮的陪衬,对他的缺点大加渲染,以至于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周瑜的性格特征仅是心胸狭隘,气量窄小。小说作者把周瑜放在战争中让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形象。

赤壁之战前,孙权决定抗曹,并令周瑜准备迎敌作战,周瑜以为孙权抗曹决心已定,但诸葛亮却告诉周瑜,孙权仍有顾虑,应当再作进一步的劝说。周瑜听后,立即去见孙权,果然,孙权的心理与诸葛亮分析的一样。小说中写道:“周瑜谢出,暗忖曰:‘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其计划又高我一头。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这次没有杀成,后来又用限期造箭的办法欲置诸葛亮于死地。他所筹划的一条条破曹的妙计,都被诸葛亮看破,于是,他处处感到诸葛亮在自己之上,是东吴的大患。这虽然有为日后“江东”大业考虑的成分,但也反映出他性格上器量狭小、忌才妒能的缺点。

马谡的骄矜轻敌、言过其实的性格则是通过失街亭一战展示出来的。街亭,地处陇西三郡的咽喉之地,是蜀国伐魏与行军运粮草的要道。当司马懿领兵出关,用兵神速时,孔明预料到司马懿“必取街亭,断吾咽喉之路”,于是,迅速作出部署。在选取街亭守将时,参军马谡请命前往。诸葛亮开始并不想让他去,说“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汝虽深通谋略,此地奈无城廓,又无险阻,守之极难”。马谡马上表明:“某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